

信息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 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张 晨 马 彪 仇焕广

摘要：信息技术作为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的重要媒介，为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实现“稳得住，能致富”提供了更便捷的工具。本文基于2019年8省（区）16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信息技术使用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技术使用对搬迁户整体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具有一定异质性。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相较于社会融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信息技术使用的促进作用对融入水平较高的群体更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还证实了信息技术使用在短期内能够通过提供就业信息、促进人情往来有效提高经济和社区文化融入。因此，应将促进信息技术使用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持续提升安置区信息化配套服务水平，建立搬迁户与迁入地社会的信息双向流动平台。

关键词：信息技术 易地扶贫搬迁 社会融入 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31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实施的一项专项扶贫工程，其目的是通过“挪穷窝、换穷业”实现精准扶贫，以期从根本上解决搬迁群体的脱贫发展问题。根据《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年度报告（2019）》，“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投入各类扶贫专项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余套，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乔迁新居，人均纯收入也从2016年的4221元提高到了2019年的9313元，年均增幅30.2%。易地扶贫搬迁计划的完成为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精准扶贫战略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移民工程，搬迁入住仅仅是第一阶段的目标。易地扶贫搬迁在改善贫困群众原有生存环境的同时，还对其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生活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保障易地扶贫搬迁户更好地融入迁入地并正常生活，已成为后续扶持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影响评估”（编号：7186147002）的资助。

本文通讯作者：仇焕广。

度来看，社会融入的好坏将直接决定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成败。发达国家移民搬迁群体的实践经验表明，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贫困搬迁户往往难以适应迁入地的生活（Lemos, 2013），加剧来自迁入地原居民对搬迁群体的歧视与偏见，如果没有必要的引导保障、融入媒介，作为弱势群体的搬迁户的贫困状况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甚至引发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冲突（Galloway and Aaberge, 2005）。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中国式扶贫智慧”，如何切实保障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相关后扶政策的重要内容。

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 ICT）泛指所有通信设备或应用软件，例如计算机、智能手机及其应用软件等。ICT 作为信息流通的重要载体，在城乡居民生活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安同良和杨晨，2020）。以中老年人为主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其文化程度、认知能力较低，在 ICT 使用方面存在诸多阻碍，如果能切实提升这部分群体的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 ICT 在生活中的便民作用，势必会对搬迁户的社会融入起到重要的“催化剂”作用。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也明确提出，要有效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让广大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ICT 使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在学术界也被多次证明。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外学者大多围绕收入、就业、农村金融、幸福感等主题开展分析。在收入方面，部分学者认为 ICT 是提高人力资本、扩展社会资本的一个有效工具，进而发现 ICT 使用具有增收效应（Ma et al., 2018）。ICT 使用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非农就业和自主创业方面，互联网的应用及推广有助于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村家庭自主创业（苏岚岚和孔荣，2020），有效丰富了农户非农就业类型和自主创业形式（王剑程等，2020）。此外，ICT 在农村金融方面也表现出强大的活力，对于信贷机构来说，ICT 使用一方面拓宽了银行信贷渠道（战明华等，2018），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户接触金融信贷的概率，为真正需要信贷资金且缺乏渠道的农户提供了援助（阮荣平等，2017）。在幸福感方面，ICT 通过购物理财、文化娱乐、互动通信等途径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交往媒介使压力得到释放，作为民主参与平台提升了人们的公平感和生活满意度，最终实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自我社会地位的认知（马晓河和胡拥军，2020）。

上述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对于 ICT 使用在多个方面的重要性和作用已经进行了诸多探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但现有文献关于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社会融入问题的关注较为不足，尚未厘清 ICT 使用与社会融入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为明确 ICT 使用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社会融入造成影响，本文将利用 2019 年 8 省（区）16 县易地扶贫搬迁一手调研数据，以搬迁户是否使用 ICT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检验 ICT 使用与搬迁户社会融入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 ICT 使用和社会融入之间可能会存在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带工具变量的条件混合估计策略和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二、机制分析与背景介绍

（一）机制分析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户来说，社会融入指他们单向的在迁入地的主动融入，反映了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的适应情况，包括经济、社区、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入等层面。社会融入是反映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生活适应状况的核心变量之一，现有研究大多从搬迁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移民搬迁及后续扶持政策等角度研究移民搬迁群体的社会融入，涉及 ICT 使用对社会融入影响的研究还较为欠缺。结合已有研究基础，本文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可能会受到其 ICT 使用行为的影响。图 1 展示了将 ICT 使用与社会融入联系起来的作用机制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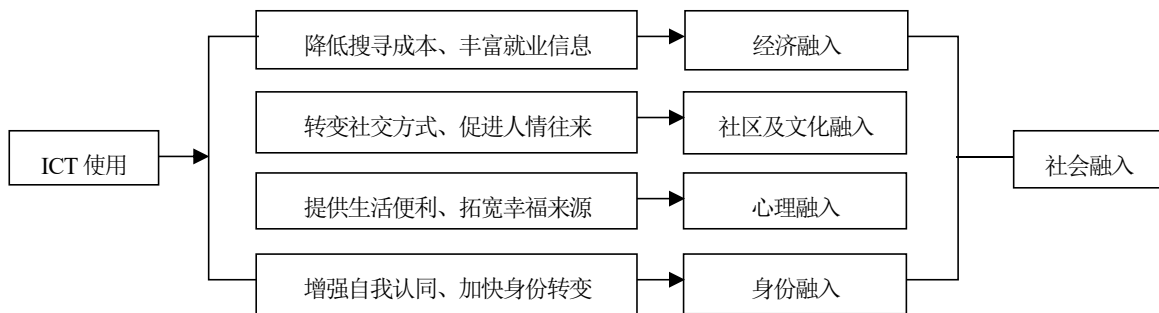


图 1 ICT 使用影响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

ICT 使用可以帮助易地扶贫搬迁户实现经济融入，主要体现在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和拓宽就业渠道方面。例如，ICT 使用可以降低搬迁户搜寻有利信息的时间成本（Ma et al., 2018），包括电商平台对接、就业信息共享、农机技术服务及金融咨询服务等，这有助于加速搬迁户对迁入地的适应速度，切实解决搬迁户在迁入地的就业需求（Elsby and Shapiro, 2012），进而推动搬迁户通过获取技术信息、提升就业稳定性、寻求金融扶持等来实现经济融入。易地扶贫搬迁虽然限制了搬迁户原有的农业收入，但搬迁后在迁入地拥有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源条件来实现转型，而 ICT 设备将成为搬迁户搜寻信息、整合资源的重要媒介（夏炎等，2018）。

ICT 使用可有效重构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资本，增加搬迁户与原居民的互动交流，进而促进社区及文化融入。由于移民搬迁往往会导致搬迁户原有的社会资本在迁入地出现失灵，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搬迁户都处于社会资本重构阶段（Ge and Wu, 2020）。而 ICT 使用为这一长期的不利条件提供了解决渠道，研究表明，ICT 使用对于重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auernschuster et al., 2014），通过拉近社交距离，促进人情往来，多种互动方式会使搬迁户在迁入地较快地实现社区及文化融入。

搬迁群体在进入迁入地初期，心理往往伴随自卑、消极等负面情绪，再加上来自生活的压力，不利于搬迁户发挥适应社会的主观能动性（Lohmann, 2015）。已有研究结论显示了 ICT 使用在心理融入方面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具体来说，一方面，ICT 使用为搬迁户在现实世界提供了多种更便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虚拟世界的文化娱乐活动也会促进搬迁户释放心理压力，这拓宽了提高

主观幸福感的渠道，进而促进心理融入（Rotondi et al., 2017）。此外，政府和社区设立的网络社区、公众号平台、线上心理咨询服务，也会正向影响搬迁户的心理融入。

身份在经济学领域已经被证实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Akerlof and Kranton, 2000），其中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又是反映社会融入的重要方面（马晓河和胡拥军, 2020）。ICT 使用可以帮助搬迁户了解易地扶贫搬迁的各项政策并形成政策预期，通过社会公平感知进而影响身份认同，虽然这一过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但 ICT 使用中获取的信息不断刺激着贫困搬迁户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感知（Banker et al., 2020），最终影响身份融入进程，因此 ICT 使用可以加快搬迁户的身份融入。

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 ICT 使用影响社会融入的重要方面，但 ICT 使用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问题尚未得到系统回答。鉴于此，本文将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检验 ICT 使用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从而为相关后扶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易地扶贫搬迁总体情况

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设计研究框架和数据采集方法，依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总体要求，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不同于国内外其他移民搬迁项目，具体特征如下：第一，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由政府主导，涉及移民搬迁群体主要为 981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以及 647 万同步搬迁人口；第二，搬迁对象的选择主要聚焦于自然资源条件贫瘠、生存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生产和长期发展条件等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第三，搬迁工程包括安置房屋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迁出地土地整改和迁出区域生态恢复等；第四，搬迁从 2016 年开始，2020 年完成并实现全部入住，总投资约 9464 亿元，总体来看投资巨大且时间紧迫；第五，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安置模式多样化，且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略作调整。

从搬迁模式来看，主要包括整村搬迁和村内部分搬迁两种。整村搬迁主要针对生存环境差、贫困程度深、地质灾害严重的村庄，整村搬迁 565 万人，占搬迁总人口的 34.7%。村内部分搬迁 1063 万人，占搬迁总人口的 65.3%。从安置模式来看，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其中集中安置 1244 万人，占搬迁总人口的 76.4%；分散安置 384 万人，占搬迁总人口 23.6%。具体来看，集中安置包括行政村内就近安置、建设移民新村安置、小城镇或工业园区安置、乡村旅游区安置和其他符合集中供养条件搬迁对象的集中安置；分散安置包括插花安置、自主务工、投靠亲友安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确保样本分布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本文充分考虑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地理区域分布、政策区域分布、安置模式和搬迁模式分布等因素，最终选取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广西、云南 8 个省份作为本文的样本省份。选择样本区域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样本省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总人口均超过 50 万，是《规划》中搬迁规模最大的 8 个省份，并且样本区域均来自于中西部省份，也是《规划》中搬迁人口的主要区域，因此可以充分代表搬迁人口的基本特征。第二，样本区域覆盖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区域，样本分布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分析具有良好的

代表性。第三，样本区域涵盖所有安置模式和搬迁模式，以及所有的迁出类型，为本文的实验组和控制组设置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在确定样本省份后，基于地理分布、政策区域、搬迁规模等因素，在每个样本省份选择2个样本县，最终抽取15个来自武陵山片区、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片区五大片区的样本县，以及1个五大片区外的国家级扶贫重点工作县，共计16个样本县。选定16个样本县以后，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抽样。首先，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和搬迁计划，在每个样本县选取2~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3个行政村或自然村，随后每个村随机抽1~2个村民小组，每个小组随机抽8户建档立卡贫困搬迁户，并在该小组内随机匹配抽取1~2户非贫困户样本，即同步搬迁户。为了保证样本的均衡，每个样本县至少满足120户建档立卡贫困搬迁户和15户非贫困同步搬迁户的样本规模要求。

根据以上抽取原则，课题组从2016年6~7月开始基期调研，共获得搬迁户调查样本2185户，总计8330人。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2019户共7649人，非贫困同步搬迁户166户共681人。本文使用的样本来自于课题组2019年对8省（区）追踪调研的截面数据，因为2019年搬迁的贫困户最多，搬迁时间较长，可以较好地识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过程。2019年课题组共获得有效样本1741户，其中已搬迁户1231户，受访者多为户主或对家庭情况较清楚的常住人口。由于未搬迁户不涉及社会融入问题，因此本文使用此部分1231户已搬迁户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二）社会融入程度的指标体系

在建立测度社会融入程度的指标体系之前，需要确定社会融入程度指标的维度。社会融入指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从经济、社区、文化、心理、身份层面的主动融入（Berry, 1997）。由于迁出地和迁入地通常在文化、经济、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移民搬迁群体为适应迁入地生活，通过与原居民之间持续的接触，会主动地向迁入地社会主流水平接近并最终实现社会融入。由此可见，社会融入根本动力在于搬迁户和迁入地社会经济条件、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社会融入最终的结果在于差异的不断削弱直至彻底消失。此外，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需要从不同维度进行测度，学术界较为认同的维度主要包括经济、社区、文化、心理、身份5个维度（杨菊华，2009）。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都基于县（区）的层面进行，没有跨市、跨省的搬迁项目，发生在县内、乡镇内、甚至村内的搬迁在文化、习俗方面大致接近，文化融入在整个社会融入过程中的难度不大（Teske and Nelson, 1974）。在文化差异较小的情况下，搬迁户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的变化更能刻画其社会融入进程。同时，文化融入与社区融入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出较为相似的变化规律，且社区融入和文化融入都强调与原居民的互动与交流，因此本文仅保留文化融入中文化娱乐消费部分，并将文化融入合并至社区融入，定义为社区及文化融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经济融入、社区及文化融入、心理融入和身份融入4个维度来测度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

在确定社会融入程度的基本维度后，需要对不同维度进行考究并选取合适的指标。首先，经济融入是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的生存基础，在迁入地拥有较为稳定的工作、收入，是移民搬迁群体长期立足的根本。由于搬迁户的经济状况通常与原居民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是反

映其经济融入程度的重要指标（Gathmann and Keller, 2018）。较低的经济融入程度与移民搬迁群体大多只有临时工作有关，他们通常面临更高的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险、金融可获得性也是影响经济融入程度的重要因素（Bratsberg et al., 2014）。鉴于此，本文选取是否在当地工作、是否签订劳务合同来衡量就业稳定性，通过居民社会保险参与和金融可获得性衡量收入稳定性，通过就业稳定性和收入稳定性来测度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经济融入程度。

其次，社区为移民搬迁群体的“和平感”和心理满足提供了基础，为搬迁户与原居民的文化接触、渗透提供了持续的契机，社区及文化融入在整个社会融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区及文化融入分为社区融入和文化融入两部分，社区融入的根本前提是对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决策有参与感（Cheong et al., 2007）。在迁入地与原居民的接触有利于移民搬迁群体实现社区的融入（Facchini et al., 2015），与原居民长期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也是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实现稳定、长期生存的关键。部分迁入地原居民对移民搬迁群体存在歧视与偏见，社区内双方容易发生争吵与冲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长期的社区融入（Esses et al., 1998）。由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是以县内搬迁为主的搬迁工程，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上较为相似，因此文化融入方面并不存在障碍，而社会融入程度的差异更多体现在搬迁后文化娱乐活动变化带来的家庭福利变化对文化融入的影响（Shauli and Gramann, 1998），这是因为文化融入程度较高的家庭普遍更重视文化娱乐活动带来的福利变动。由于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休闲娱乐活动行为也必然发生改变，这为观测和分析文化融入程度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鉴于此，本文从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与原居民接触范围、与原居民是否和睦相处和文化娱乐消费水平 4 方面来测度搬迁后的社区及文化融入程度。

再次，心理融入是较高层次的融入，指移民搬迁群体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对迁入地原居民产生认同并主动适应迁入地区生活，认为自己是迁入地的“一部分”，是自身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的统一（Yinger, 1981）。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是考察心理融入程度的有效指标，是否打算在迁入地长期生活代表心理上对于迁入地社会的归属感，移民搬迁决定的后悔程度也是这种归属感的重要内容（Tropp et al., 1999）。此外，较好的心理融入与搬迁户对迁入地原居民信任有关（Harker, 2001）。对迁入地的生活满意度是心理融入程度的重要方面（Angelini et al., 2015），从心理层面反映了搬迁户在迁入地的适应状况。鉴于此，本文从是否在迁入地长期居住、是否后悔搬迁、对迁入地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和迁入地生活满意度 4 方面来测度搬迁户的心理融入程度。

最后，身份融入意味着在迁入地对移民搬迁群体的身份认同，是体现社会地位变化的融入过程，将身份融入纳入社会融入测度十分必要。已有研究表明，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中对于身份与地位的感知，与移民搬迁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有紧密的联系（Büchel and Frick, 2005）。移民搬迁群体对于生活变化的承受能力是脆弱的，当搬迁户在迁入地生活得不幸福，他们会因怀旧而放缓身份融入的节奏（Akhtar, 1995）。此外，搬迁户在迁入地和原迁出地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必然存在变化而产生差异，且从相对贫瘠的地区搬到经济相对优越的社会，往往会受到来自迁入地原居民的歧视与排挤，他们感到不公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自尊心受到伤害、抑郁情绪和亲子冲突等（Rumbaut, 1994），这会对搬迁户的社会融入造成不利影响。家庭作为搬迁户生活的基础单元，在身份融入过程中家人的陪伴会起

到纽带作用，青少年的自我认同会影响父母的身份融入，父母的身份融入也会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即家庭内部成员的身份融入存在代际传递现象。与那些没有家人陪伴的家庭相比，举家搬迁家庭内部成员的自尊心就更不容易受到伤害，焦虑和家庭冲突也就更少，身份融入就越顺利（Teresa and Christian, 2010），因此是否举家搬迁是影响身份融入的因素之一。鉴于此，本文从是否迁移户口、是否举家搬迁、回迁频率、迁入地和迁出地身份等级变化 4 方面来测度搬迁户的身份融入程度。

为综合评价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本文使用熵值法计算社会融入程度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对指标进行降维，为后文的社会融入相关分析提供依据。熵值法是根据指标的变异信息量来确定指标权重。利用信息熵工具计算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可以避免由于主观人为因素引致的权重设定偏误，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有效依据。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指标值的变化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小，指标的权重越大；相反，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则不确定性越大，信息熵也越大，指标的权重就越小。具体来说，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模糊综合评价矩阵和各因素输出的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值，并对指标的权重采用熵值法进行修正，得到最终的指标权重。使用熵值法赋权可以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指标的信息，符合客观情况，是常用的指标评价方法。

根据熵值法确定社会融入程度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后，本文基于权重将指标加权平均得到社会融入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为了更清晰地显示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本文使用功效系数法将社会融入程度综合评价指标标准化为 0~100 的分值指标，得分值越高表示搬迁户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同时，使用同样的方法测算经济融入程度、社区及文化融入程度、心理融入程度和身份融入程度。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程度指标体系的构成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社会融入程度指标体系构成及描述性统计

维度	指标及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权重
经济融入	户主是否在本地工作：是=1，否=0	0.709	0.454	0.030
	户主是否签订劳务合同：是=1，否=0	0.179	0.383	0.150
	户主是否参加居民社保：是=1，否=0	0.937	0.243	0.006
	金融可获得性：知晓社区周围可贷款金融机构的数量（个）	1.990	1.688	0.021
社区及文化融入	参加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频率：经常参加=3，偶尔参加=2，不参加=1	2.247	0.814	0.028
	与迁入地原居民的接触频率：非常多=5，很多=4，一般=3，很少=2，非常少=1	2.756	0.977	0.019
	是否与周边邻居和睦相处：是=1，否=0	0.671	0.470	0.035
	年平均文化娱乐活动消费：5000 元及以上=4，3000~5000 元（含 3000 元）=3，1000~3000 元（含 1000 元）=2，1000 元以下=1	1.055	0.228	0.253
	是否打算长期在迁入地居住：是=1，否=0	0.661	0.474	0.036
心理融入	搬迁是否后悔：不后悔=1，后悔=0	0.619	0.486	0.042
	对迁入地原居民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5，信任=4，一般=3，不信任=2，非常不信任=1	3.867	0.983	0.007
	迁入地生活满意度：0~100 分，分数越高，满意度越高	76.213	19.716	0.007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身份融入	是否迁移户口：是=1，否=0	0.068	0.251	0.235
	是否举家搬迁：是=1，否=0	0.632	0.482	0.040
	回迁频率：从不回去=3，偶尔回去=2，经常回去=1	1.646	0.817	0.079
	迁出地与迁入地身份等级变化：迁入地身份地位评分减去迁出地身份地位评分，分值范围为-10~10分	0.855	1.648	0.012

(三)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为了分析 ICT 使用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SI_i = \beta_0 + \beta_1 ICT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SI_i 为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核心解释变量 ICT_i 为搬迁户 ICT 使用情况，包括搬迁户是否使用智能手机、计算机和微信； X_i 为控制变量，包括搬迁户的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社会资本特征、家庭特征和搬迁政策等。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社会融入变量	社会融入程度	社会融入程度得分：0~100 分，分值越高，融入程度越高	44.150	19.360
	经济融入程度	经济融入程度得分：0~100 分，分值越高，融入程度越高	47.020	33.020
	社区及文化融入程度	社区及文化融入程度得分：0~100 分，分值越高，融入程度越高	27.220	17.500
	心理融入程度	心理融入程度得分：0~100 分，分值越高，融入程度越高	74.330	20.420
	身份融入程度	身份融入程度得分：0~100 分，分值越高，融入程度越高	33.790	21.360
ICT 使用变量	智能手机使用	受访者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是=1，否=0	0.570	0.500
	计算机使用	受访者是否使用计算机：是=1，否=0	0.050	0.210
	微信使用	受访者是否使用微信：是=1，否=0	0.360	0.480
基本特征变量	年龄	受访者年龄（岁）	55.030	12.120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年）	5.110	3.350
	社会网络	受访者在迁入地新结识的朋友数量（人）	31.140	39.760
	就业培训	受访者是否参加就业培训：是=1，否=0	0.420	0.490
	党员身份	受访者是否为党员：是=1，否=0	0.080	0.280
	干部身份	受访者是否为村干部：是=1，否=0	0.030	0.170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人）	3.840	1.530
	劳动力占比	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总人口数	0.660	0.290
	是否贫困户	是否为贫困搬迁户：是=1，否=0	0.970	0.160
	最近市场距离	新家到最近市场的距离（公里）	7.370	10.980
	搬迁时间	搬迁到迁入地的时间（月）	16.330	9.950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 1	安置区信号基站数量（个）	1.150	0.870
	工具变量 2	迁入地互联网覆盖率（%） ^a	47.100	29.750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工具变量 3	安置区宽带开通年限（年）	2.780	1.390
机制分析 变量	就业信息	受访者是否熟悉去哪里找工作：非常熟悉=5，熟悉=4，一般=3，不熟悉=2，非常不熟悉=1	3.678	1.263
	人情往来	家庭年均人情往来送礼支出（千元）	1.552	2.361
	生活便利	迁入地生活便利的认同程度：非常认同=5，认同=4，一般=3，不认同=2，非常不认同=1	4.449	0.713
	自我认同	认同自己是迁入地本地人的程度：非常认同=5，认同=4，一般=3，不认同=2，非常不认同=1	4.544	0.788

注：a.该指标数据通过对地方干部、社区负责人调查形成的村问卷获得。

从被解释变量来看，2019年搬迁户的平均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均值为44.15分。其中，心理融入程度较高，均值为74.33分；社区及文化融入程度最低，均值仅为27.22分，说明搬迁户与迁入地原居民间的社会互动存在一定阻力；经济融入程度较高，说明易地扶贫搬迁对于搬迁户在迁入地基本生活的后续扶持较为重视；身份融入程度得分均值为33.79，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搬迁户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仍需被关注。

ICT使用方面，57%的搬迁户已经使用智能手机，对于ICT设备的使用有一定经验，但微信使用比例却较智能手机低了21个百分点，说明ICT软件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阻碍。计算机的使用比例不足10%，说明较复杂的ICT技术对搬迁户来说门槛依然较高。

四、实证分析

（一）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本文重点分析ICT使用对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的影响。然而，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却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由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ICT在通过降低搜寻成本、转变社交方式、提供生活便利以及增强自我认同四条路径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的同时，社会融入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户的ICT使用情况。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情况的改善，搬迁户对ICT使用需求和认知可能也会随之变化。因为，对搬迁户来说，ICT不仅是简单的通讯设备或通讯软件，还是信息来源、社交媒介和生活助手。从这个角度上看，易地扶贫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程度越高，他们对ICT使用频率也越高。此外，对没有ICT使用经历的搬迁户来说，受到社会融入群体效应的影响也可能转向ICT使用。另外一大挑战来自截面数据带来的遗漏变量问题。尽管本文在模型设定中控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搬迁政策等一系列可能影响社会融入的关键变量，但基于截面数据的回归模型却无法有效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为克服上述两大研究挑战，本文拟在基准OLS回归的基础上引入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本文采用搬迁前安置区内信号基站数量、迁入地互联网覆盖率以及安置区宽带开通年限作为易地扶贫搬迁户ICT使用情况的三个工具变量。其中，安置区内信号基站数量反映的是迁入地通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迁入地互联网覆盖率反映了迁入地居民（不包括搬迁户）

的互联网使用程度，安置区内开通宽带年限则表征了迁入地的信息化进程。

选择搬迁前安置区内信号基站数量作为易地扶贫搬迁户 ICT 使用情况的工具变量是因为这一变量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安置区内移动通讯环境，并且搬迁前的安置区内移动通讯环境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 ICT 使用情况高度相关。现实中，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于 2016 年陆续在全国各地实施，而标志着开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4G 网络早在 2013 年就开始建设并投入使用，换句话说，在易地扶贫搬迁户入住安置区之前，安置区内的信号基站数量和移动通讯环境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些均由搬迁发生前一时期当地信息化建设投入情况决定，并不会随搬迁户进入迁入地而发生明显变化，即搬迁前安置区内的信号基站数量不直接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情况，可视为外生变量。

本文选择的另外两个工具变量是迁入地的互联网覆盖率和安置区内的宽带开通年限。与信号基站数量相比，宽带建设更多的是对 PC 端的辐射，而 PC 端也是 ICT 使用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同安置区内信号基站数量类似，网络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不会产生社会功效，而需要借助 ICT 这一媒介发挥预定的互联功能，即易地扶贫搬迁发生前安置区内的互联网建设情况并不会直接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户安置后的社会融入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上述解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搬迁前安置区内信号基站数量、迁入地互联网覆盖率以及宽带开通年限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一定严格满足排他性和外生性，因此本文还将在正式回归之前对上述工具变量进行一系列严格的统计学检验。

（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为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在正式回归之前对使用的工具变量进行了一系列检验。首先参考方颖和赵扬（2011）的做法对 3 个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3。将 ICT 使用和工具变量分别对社会融入程度进行回归，二者都显著；在控制 ICT 使用的前提下，安置区内信号基站数量、迁入地互联网覆盖率和安置区开通宽带年限 3 个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并不直接影响社会融入程度，而仅仅通过 ICT 使用影响社会融入程度。

表 3 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结果

	社会融入程度		
ICT使用（以智能手机为例）	7.404*** (1.101)		7.150*** (1.200)
工具变量1		0.041* (0.021)	0.014 (0.022)
工具变量2		1.266*** (0.420)	0.579 (0.415)
工具变量3		2.666** (1.238)	-10.244 (22.401)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4.508*** (2.196)	36.285*** (1.663)	47.146*** (12.097)

样本容量	1231	1231	1231
R ²	0.171	0.023	0.173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村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见表 4。从不可识别检验的结果来看，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为 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符合秩条件成立的基本要求。在过度识别检验方面，无论是基于同方差条件得到的 Sargan 统计量，还是异方差条件下的 Hansen J 统计量，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均大于 0.1，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要求。在弱工具变量检验方面，Cragg-Donald 统计量为 13.592，大于 10%偏误下的临界值 6.46，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表 4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

检验类别与统计量	以智能手机使用代表 ICT 使用	以计算机使用代表 ICT 使用
不可识别检验：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41.566 (0.000)	8.135 (0.0171)
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 统计量	13.592	10.469
过度识别检验：Sargan 统计量	0.347 (0.8409)	0.001 (0.9704)
Hansen J 统计量	0.345 (0.8414)	0.002 (0.9679)

注：括号内为 p 值。

(三) 基准回归结果

表 5 报告了 ICT 使用对社会融入程度的基准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均采用聚类到村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这里用智能手机使用和计算机使用来代表 ICT 使用，其中（1）列和（4）列分别为二者的 OLS 估计结果。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还使用 2SLS 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2）列和（5）列所示。

一般情况下，使用 2SLS 处理内生性问题是有效的，但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ICT 使用为二分变量，第一阶段回归不宜使用 OLS 线性模型，因此使用 2SLS 并不能达到求解要求。为此，本文利用 STATA 环境下的 CMP 模型来解决混合模型的一致性估计问题。CMP 模型是 STATA 环境下的一种混合估计策略，是估计两阶段或三阶段模型的常用估计方法，其优点是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在每阶段设置具体的模型形式，并作为系统方程汇报某些关键统计量。本文利用 CMP 模型将 2SLS 回归的第一阶段模型更改为 Probit 模型，（3）列和（6）列为具体的回归结果。

表 5 结果表明，无论以智能手机使用还是计算机使用代表 ICT 使用，ICT 使用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估计结果表明，ICT 使用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并且智能手机使用带来的促进作用更大。

信息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以智能手机使用代表ICT使用			以计算机使用代表ICT使用		
	OLS (1)	2SLS (2)	CMP (3)	OLS (4)	2SLS (5)	CMP (6)
ICT使用	4.317*** (1.058)	23.440*** (7.018)	21.153*** (7.377)	5.401** (2.476)	17.860** (8.421)	16.196*** (5.207)
年龄	-0.152*** (0.049)	0.044 (0.089)	0.021 (0.092)	-0.199*** (0.048)	-0.228*** (0.062)	-0.204*** (0.049)
受教育程度	0.068 (0.185)	-0.168 (0.212)	-0.140 (0.211)	0.109 (0.183)	-0.023 (0.235)	0.087 (0.180)
社会网络	0.033** (0.015)	0.039** (0.019)	0.039** (0.018)	0.031** (0.015)	0.034** (0.017)	0.030** (0.015)
就业培训	0.719 (1.054)	-1.713 (1.448)	-1.422 (1.505)	1.126 (1.061)	-0.487 (1.294)	0.840 (1.083)
党员身份	3.524** (1.773)	3.520* (1.988)	3.521* (1.941)	3.342* (1.751)	4.610** (1.876)	2.976* (1.692)
干部身份	2.299 (3.678)	1.586 (3.870)	1.671 (3.823)	2.582 (3.645)	0.573 (5.062)	2.827 (3.508)
家庭规模	2.227*** (0.378)	1.550*** (0.475)	1.631*** (0.468)	2.302*** (0.375)	1.551*** (0.448)	2.146*** (0.369)
劳动力占比	7.865*** (1.786)	5.489** (2.269)	5.773** (2.267)	8.168*** (1.789)	6.870*** (2.377)	7.699*** (1.801)
是否贫困户	0.684 (4.126)	1.444 (4.342)	1.353 (4.322)	0.643 (4.173)	-0.751 (4.029)	0.906 (4.167)
最近市场距离	-0.062 (0.044)	-0.069 (0.054)	-0.068 (0.052)	-0.058 (0.045)	-0.090 (0.068)	-0.052 (0.046)
搬迁时间	0.273*** (0.056)	0.247*** (0.060)	0.251*** (0.060)	0.275*** (0.057)	0.223*** (0.074)	0.267*** (0.058)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6.141*** (5.341)	1.198 (8.111)	2.985 (8.322)	20.044*** (5.289)	26.125*** (6.189)	21.101*** (5.229)
样本容量	1231	1231	1231	1231	1231	1231
R ²	0.225			0.218		
CMP模型统计量			2.926*** (0.074)			2.848*** (0.021)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村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变量中，年龄对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显著，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年龄越大的搬迁户社会融入程度越低。社会网络和党员身份与社会融入程度正相关，说明新结识的社会资本已经在社会融入过程

中发挥作用，而党员身份带来的政治资本也可以正向促进搬迁户的社会融入。此外，家庭规模和劳动力占比与社会融入也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说明搬迁户家庭内部劳动力占比越高，社会融入程度越高。搬迁时间在 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说明搬迁时间与社会融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基于普通分位数和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的异质性估计

虽然 OLS 模型和 CMP 模型的回归结果都表明 ICT 使用能够显著提高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但基于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能会低估 ICT 使用促进社会融入的作用，而通过 CMP 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则可能会高估 ICT 使用促进社会融入的作用，而且无论是 OLS 估计还是 CMP 估计，均无法有效观测 ICT 使用对不同社会融入程度群体影响的差异。为此，本文利用普通分位数和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展开进一步分析。

表 6 报告了普通分位数模型和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普通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当社会融入程度在 0.1 和 0.25 分位点时，ICT 使用并不显著，这表明 ICT 使用对社会融入程度较低的搬迁户的社会融入促进作用不明显。随着社会融入程度分位点不断上升，ICT 使用对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开始显著，且在 0.5 分位点达到峰值。由于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不是一个随机过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使用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融入程度在 0.1 分位点时，ICT 使用的系数为 14.799，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随着分位数提高，ICT 使用对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并在 0.95 分位点达到峰值。

表 6 ICT 使用对社会融入程度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分位点	普通分位数		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tau=0.1$	1.681	2.024	14.799***	5.605
$\tau=0.25$	1.565	1.917	20.205**	8.012
$\tau=0.5$	6.295***	1.466	23.449**	9.622
$\tau=0.75$	4.389***	1.505	27.467***	8.344
$\tau=0.95$	4.402**	1.971	29.562*	17.974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表中为以智能手机使用代表 ICT 使用的估计结果。

考虑内生性后的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ICT 使用对不同社会融入程度搬迁户的社会融入都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对高融入程度搬迁户的促进作用约为低融入程度搬迁户的 2 倍，这表明 ICT 使用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增现象。总体来看，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值要高于普通分位数模型，ICT 使用与社会融入的内生性问题会低估其影响。

（五）机制验证

ICT 使用可以显著地提高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而社会融入程度又可细分为经济融入程度、社区及文化融入程度、心理融入程度和身份融入程度 4 个方面，为明晰 ICT 使用与这四类融入程度的关系，本文进一步使用 CMP 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结果表明，ICT 使用促进了经济融入和社区及文化融入，其中对经济融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但对心理融入和身份融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从经济融入程度看，ICT 使用可以显著地促进搬迁户的经济融入，说明 ICT 使用确实对搬迁户的工作稳定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降低搜寻成本、提供就业信息这条作用路径。从社区及文化融入程度看，ICT 使用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 ICT 使用可以促进搬迁户的社区及文化融入。ICT 使用对心理融入程度和身份融入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这是由于心理融入和身份融入属于较高层次的社会融入，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时间尚短，短期内效果还不明显。

表 7 ICT 使用对四类融入的回归结果

	经济融入程度	社区及文化融入程度	心理融入程度	身份融入程度
ICT使用	19.468** (8.935)	13.977*** (2.791)	-1.050 (3.611)	0.777 (5.257)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385 (9.756)	17.484*** (6.039)	56.663*** (5.884)	28.094*** (6.518)
样本容量	1231	1231	1231	1231
CMP模型统计量	3.377*** (0.025)	2.826*** (0.046)	2.915*** (0.024)	2.910*** (0.020)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村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表中为以智能手机使用代表 ICT 使用的估计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图 1 中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 4 条路径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图 2。结果显示，ICT 使用通过 2 条路径影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分别是就业信息、人情往来，即 ICT 使用通过丰富就业信息、促进人情往来显著提高了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

但是，ICT 使用并未通过第 3、4 条路径中的生活便利、自我认同间接影响社会融入程度，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身份认同是较高等级的自我价值体现，在短期内往往难以得到质的改变，这与 Zhu et al. (2020) 的研究结论一致，也印证了表 7 的回归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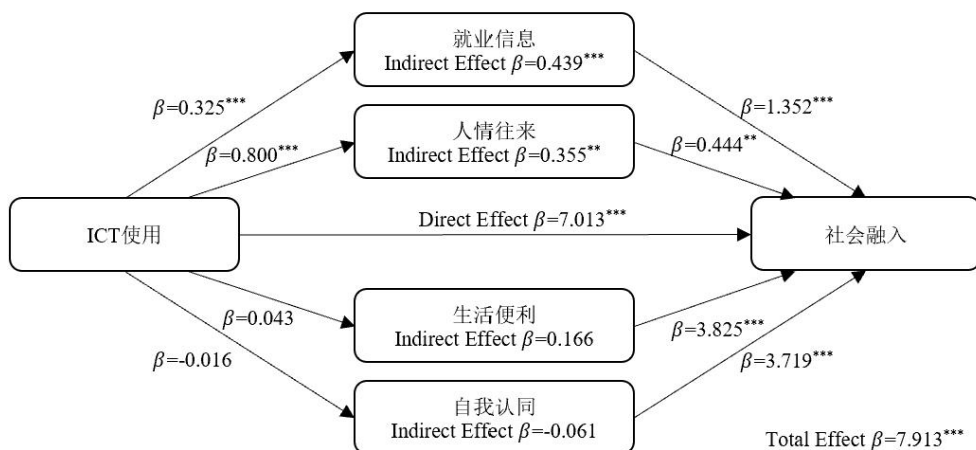


图 2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五、稳健性检验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基准回归中的个别变量，如智能手机使用等，采用的是二元变量，若直接将已使用智能手机的搬迁户和尚未使用的搬迁户进行对比，可能存在配对偏差。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 ICT 使用（以智能手机使用为例）促进社会融入的效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不同的匹配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样本损失，为使课题组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大规模调研数据得到充分利用，本文选择了核匹配、半径匹配和 k 近邻匹配 3 种方法进行匹配。核匹配、半径匹配和 k 近邻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良好，样本损失比例很小，只有 10 个搬迁户样本不在共同支撑域内。此外，考虑到倾向得分匹配第一阶段估计倾向得分时存在不确定性，本文对传统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第一步进行了偏差校正，尽可能避免因非精确匹配而产生的偏差。

表 8 报告了上述四种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根据核匹配的测算结果，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4.760，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半径匹配和 k 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与核匹配基本一致，二者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 5.639 和 5.565，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经过偏差校正后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4.881，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结果表明，ICT 使用对搬迁户的社会融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8 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		
	实验组	对照组	ATT
核匹配（带宽=0.06）	47.407	42.647	4.760***
半径匹配（卡尺=0.01）	47.459	41.820	5.639***
k 近邻匹配（k=4）	47.407	41.842	5.565***
偏差校正匹配			4.881***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偏差校正法的权重矩阵是主对角线元素为各变量样本方差的逆矩阵，ATT 标准误为 A-I 标准误；其余匹配方法的 ATT 标准误为自助稳健标准误，重复抽样次数 500 次。

（二）处理效应模型

倾向得分匹配法在消除选择性偏差和处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时，只考虑可观测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忽略不可观测因素的作用，因而存在估计偏误。处理效应模型（TEM）同样是解决选择性偏差的常用方法，相较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效应模型可同时考虑可观测因素和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此外，处理效应模型可以进一步计算 ICT 使用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程度的平均处理效应。

本文在 TEM 模型中选择的排他性变量与 CMP 模型的工具变量保持一致。表 9 汇报了智能手机使用、计算机使用和微信使用对社会融入程度的 TEM 模型估计结果，分别代表 ICT 使用在移动端、pc 端和软件上的效果。ICT 使用的平均处理效应和 CMP 模型的回归结果相近，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稳

健性。

表 9 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智能手机使用	计算机使用	微信使用
ICT使用	21.786*** (5.963)	16.195*** (5.207)	13.572*** (4.263)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491 (7.483)	21.101*** (5.229)	15.312*** (5.546)
样本容量	1231	1231	1231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村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ICT 设备、软件使用与社会融入程度

由于样本中使用计算机的搬迁户数量较少，因此本文将计算机使用和智能手机使用合并为 ICT 设备使用。此外，样本中使用智能手机和使用微信的样本比例并不一致，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户对于信息软件的掌握能力还较为欠缺，为此，本文以微信使用代表 ICT 软件使用。以 ICT 设备使用和 ICT 软件使用为解释变量使用 CMP 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10 所示。

整体来看，ICT 软件使用对社会融入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略低于 ICT 设备的促进效果。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ICT 设备与 ICT 软件之间存在脱钩，搬迁户使用智能手机仅仅停留在通讯层面，没有进一步发挥 ICT 软件的作用；第二，对于已经使用 ICT 软件的搬迁户来说，对于复杂的应用软件较为生疏，在搜寻信息、获取便捷生活方面效率较低。

表 10 ICT 设备使用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1)	(2)
ICT设备使用	20.300*** (6.918)	
ICT软件使用		13.520*** (4.502)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401 (7.646)	15.328*** (5.558)
样本容量	1231	1231
CMP模型统计量	2.913*** (0.067)	2.842*** (0.026)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村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ICT 使用时间与融入程度

本文以 ICT 使用时间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使用 2SLS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结果显示，

除计算机使用以外，ICT 使用时间对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低于是否使用 ICT。这是由于智能手机和手机 APP 上手操作难度要低于计算机的使用，搬迁户短期内就可以熟练掌握智能手机和 APP 的使用方法。而计算机的操作门槛较高，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带来的边际收益会更高，因此从 ICT 使用时间来讲，使用计算机的时间越久，就越能促进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表 11 ICT 使用时间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以智能手机使用时间代表 ICT使用时间	以计算机使用时间代表ICT 使用时间	以微信使用时间代表ICT使 用时间
ICT使用时间	5.222*** (1.724)	18.978** (8.206)	6.310*** (1.966)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755 (7.749)	25.854*** (6.135)	10.593 (6.826)
样本容量	1231	1231	1231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村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是易地扶贫搬迁后扶政策效果的关键体现。在信息化社会，ICT 已经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对人们的生活造成深刻影响。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户来说，ICT 更是可以帮助他们在迁入地立足的重要工具。但是，目前学术界对 ICT 使用与社会融入间关系的研究还较为欠缺，并且目前易地扶贫搬迁的后扶政策对搬迁户 ICT 使用的关注度还不足。鉴于此，本文基于 2019 年易地扶贫搬迁 8 省（区）16 县的搬迁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 ICT 使用对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未使用 ICT 的搬迁户相比，使用 ICT 对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ICT 使用在短期内通过丰富就业信息、促进人情往来加快了搬迁户的经济融入和社区文化融入。ICT 使用促进社会融入的效果存在异质性，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则 ICT 促进效果越好，ICT 的促进存在边际收益递增现象。因此，加快贫困人口信息化水平提升是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后扶政策的重要方向。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方面，相较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策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ICT 使用的促进作用具有易掌握、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无论是从短期考虑的降低工作搜寻成本和增加社会互动，还是从长期来看的心理认同及身份转变过程，ICT 使用的促进效果都要大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搬迁政策的影响。那么，如果可以在有效推动贫困搬迁户“智能化、信息化”的前提下，建立搬迁户与迁入地社会间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还可以增强搬迁户在迁入地长效减贫的内生动力。此外，由于贫困户中有较高比例都是老年人，甚至年轻人也因为经济原因缺少 ICT 的使用经验，因此，不断提高 ICT 在搬迁户中的普及程度，持续加强迁入地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搬迁户在迁入地的长期稳定和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ICT 使用对于个人、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有能力和有意愿的搬迁户，应对他们进行 ICT 设备的进阶使用培训，如文字编辑工作、视频剪辑工作、简单编程训练等，从短期来看可以解决搬迁户的经济融入和社区文化融入问题，长期则可以促进其心理融入和身份融入。除了相关培训外，当地政府应加快建设安置区内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以及搬迁户与迁入地社会间的信息互动平台，真正为贫困搬迁户提供便捷、有效、实用的信息资源库。易地扶贫搬迁切实解决了 960 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当下工作重心开始向后续扶持工作转移，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相关后续扶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 1.安同良、杨晨，2020：《互联网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微观机制与宏观效应》，《经济研究》第 2 期，第 4-19 页。
- 2.方颖、赵扬，2011：《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估计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第 5 期，第 138-148 页。
- 3.马晓河、胡拥军，2020：《“互联网+”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框架与政策设计》，《宏观经济研究》第 7 期，第 5-16 页。
- 4.阮荣平、周佩、郑风田，2017：《“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化发展状况及对策建议——基于全国 1394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数据》，《管理世界》第 7 期，第 50-64 页。
- 5.苏岚岚、孔荣，2020：《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创业增益了吗？——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 2 期，第 62-80 页。
- 6.夏炎、王会娟、张凤、郭剑锋，2018：《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影响研究——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模型》，《中国科学院院刊》第 7 期，第 707-716 页。
- 7.王剑程、李丁、马双，2020：《宽带建设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乡村”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经济学（季刊）》第 1 期，第 209-232 页。
- 8.杨菊华，2009：《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 1 期，第 17-29 页。
- 9.战明华、张成瑞、沈娟，2018：《互联网金融发展与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经济研究》第 4 期，63-76 页。
- 10.Akerlof, A., E. Kranton, 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 715-753.
- 11.Akhtar, A., 1995, “Third Individuation: Immigration, Identity, and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3(4): 1051-1084.
- 12.Angelini, V., L. Casi, and L. Corazzini, 2015, “Life Satisfaction of Immigrants: Does Cultural Assimilation Matter?”,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8(3): 817-844.
- 13.Bauernschuster, S., O. Falck, and L. Woessmann, 2014, “Surfing Alon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from an Unforeseeable Technological Mistak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17(1): 73-89.

14. Banker, S., P. Bhanot, and A. Deshpande, 2020, "Poverty Identity and Preference for Challenge: Evidence from the US and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76(1): 202-214.
15. Berry, W.,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46(1): 5-34.
16. Bratsberg, B., O. Raaum, and K. Roed, 2014, "Immigrants,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and Social Insur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124(580): 644-683.
17. Büchel, F., and R. Frick, 2005, "Immigrants' Economic Performance Across Europe – Does Immigration Policy Matter?",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4(2): 175-212.
18. Cheong, H., R. Edwards, H. Goulbourne, and J. Solomos, 2007, "Immigr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capital: A critical review",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7(1): 24-49.
19. Elsby, W., and D. Shapiro, 2012, "Why Does Trend Growth Affect Equilibrium Employment? A New Explanation of an Old Puzz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4): 1378-1413.
20. Esses, M., M. Jackson, and L. Armstrong, 1998, "Intergroup Competi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An Instrumental Model of Group Conflic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4(4): 699-724.
21. Facchini, G., E. Patacchini, and F. Steinhardt, 2015, "Migration, Friendship Ties, and Cultural Assimilation",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2): 619-649.
22. Galloway, A., and R. Aaberge, 2005, "Assimilation Effects on Poverty among Immigrants in Norwa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8(4): 691-718.
23. Gathmann, C., and N. Keller, 2018, "Access to Citizenship and the Economic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128(616): 3141-3181.
24. Ge, T., and T. Wu, 2020, "Search, Migration, and Social Connections: Solving the Migration Puzzle to Beiji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62(1): 501-515.
25. Harker, K., 2001, "Immigrant Generation, Assimilation,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ocial Forces*, 79(3): 969-1004.
26. Lemos, S., 2013, "Immigrant Economic Assimilation: Evidence from UK Longitudinal Data Between 1978 and 2006", *Labour Economics*, 24(1): 339-353.
27. Lohmann, S., 2015,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Does the Internet Raise Material Aspiration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7(3): 740-759.
28. Ma, W., A. Renwick, P. Nie, and R. Cai, 2018, "Off-Farm Work, Smartphone Use and Household Incom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2(1): 80-94.
29. Rotondi, V., L. Stanca, and M. Tomasuolo, 2017, "Connecting Alone: Smartphone Use, Qual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63(1): 17-26.
30. Rumbaut, G., 1994, "The Crucible Within: Ethnic Identity, Self-Esteem, and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mong Children of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8(4): 748-794.
31. Shaull, L., and H. Gramann, 1998, "The Effect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Related and

Nature-Related Recreation among Hispanic Americans”,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30(1): 47-63.

32. Teresa, C., and D. Christian, 2010, “Immigrants’ Identity, Economic Outcom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Identity Across Generations”, *Economic Journal*, 120(1): 31-51.

33. Teske, C., H. Nelson, 1974,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A Clarific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1(2): 351-367.

34. Tropp, R., S. Erkut, and G. Coll, 1999, “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 Development of a New Measure for Puerto Ricans on the US Mainland”,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59(2): 351-367.

35. Yinger, M., 1981, “Toward a Theory of Assimilation and Dissimil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3): 249-264.

36. Zhu, Z., W. Ma, A. Sousa-Poza, and C. Leng, 2020, “The Effect of Internet Usage on Perceptions of Social Fairnes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62(1): 501-508.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胡 祎)

Can the Use of ICT Improv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ZHANG Chen MA Biao QIU Huanguang

Abstract: ICT,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obtaining and utiliz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provides more convenient tools for poor households to achiev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ir places of residence.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data from a survey in 16 counties, 8 provinces in 2019,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ICT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ICT has an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households, but it has some heterogeneity.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CQTE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groups with lower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CT use is greater for the groups with higher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Further analysis also confirms that the use of IC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economic and community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short term. To this end, training on the use of IC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follow-up support polic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The level of support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resettlement area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a two-way information interactive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displaced households and the society in the relocated areas.

Keywords: ICT;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Social Integration; Influence Mechanism